

A Collection  
of Essays  
on Wang Jiaxin

新时期文学研究  
资料丛刊



# 王家新诗歌研究 评论文集

张桃洲——选编

A Collection  
of Essays  
on Wang Jiaxin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家新诗歌研究评论文集 / 张桃洲编. —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17.7

ISBN 978-7-5473-1131-8

I. ①王… II. ①张… III. ①诗歌评论—中国—当代  
—文集 IV. ①I207.2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19207号

## 王家新诗歌研究评论文集

---

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上海市仙霞路345号

电 话：(021) 62417400

邮政编码：200336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90×1240毫米 1/32

字 数：379千字

印 张：17.125

版 次：2017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73-1131-8

定 价：68.00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东方出版中心邮购部 电话：(021) 52069798

# 目 录

我们这个时代的写作 / 非 默 001

王家新论 / 程光炜 006

王家新：承受中的汉语 / 藏 棍 020

王家新诗二首赏析 / 陈 超 030

个人对时代的承担：《帕斯捷尔纳克》 / 陈思和 039

“锻造一个种族的尚未诞生的良心” / 吴晓东 043

词语写作：思想缩减时期的修辞策略 / 陈晓明 076

没有故事的生活

——从王家新的《回答》看当代诗学的叙事问题

/ 耿占春 082

现代诗歌的位置

——王家新与20世纪90年代诗歌型变 / 张桃洲 104

诗之锻造：王家新论 / 牛遁之 118

我们时代的诗歌教师 / 李建春 136

对一只冰斧的阅读

——论王家新诗歌近作 / 胡 桑 146

王家新：从“承担的诗学”到“辨认的诗学” / 程一身 159

词语书写的另一种标志 / 孙 郁 165

读《塔可夫斯基的树》 / 洪子诚 175

把灵魂朝向这一切吧，诗人（节选） / 刘 春 188

承担意识、批判精神与日常逻辑

——王家新诗歌论 / 刘 波 208

王家新2000年以来诗思诗作研究：以“晚期”为切入点

/ 袁一月 227

“母语分娩时的阵痛”

——读王家新译诗集《带着来自塔露萨的书》 / 胡国平 283

为了未来的翻译：读王家新译诗集 / 陈 庆 293

辨认的诗学

——读《带着来自塔露萨的书》 / 唐不遇 301

“一只燕子神性的抛洒”

——读王家新译《新年问候：茨维塔耶娃诗选》

/ 远 洋 305

钢琴和乐队的对话：王家新的诗歌翻译与创作 / 梁新军 311

“我躺在大地深处，嘴唇还在蠕动”

——读王家新译曼德尔施塔姆诗选 / 杨东伟 330

“我必须以我全部的肺来呼吸你们”

——读王家新译《我的世纪,我的野兽:曼德尔施塔姆诗选》

/ 张高峰 339

“满满一吊桶的风暴”

——评王家新译曼德尔施塔姆诗选 / 李海鹏 347

王家新:冬天的精神 / [美]罗伯特·哈斯(Robert Hass) 353

王家新的诗 / [德]顾彬(Wolfgang Kubin) 369

柚子的幽香——阅读王家新

/ [美]乔治·欧康奈尔(George O'Connell) 370

王家新《冬天的诗》译者前言

/ [德]弗兰克·克劳斯哈尔(Frank Kraushaar) 373

城市,记忆

——以王家新的诗片断为例

/ [法]艾里克·列斐伏尔(Eric Lefebvre) 375

越界的诗歌与灵魂的在场:王家新访谈

/ [美]江克平(John A. Crespi) 381

“花朵永恒,天空完整”

——关于王家新对曼德尔施塔姆一首诗的翻译

/ [亚美尼亚]罗伯特·察杜梁(Robert Tsaturyan) 391

韩国昌原第4届KC国际诗文学奖颁奖理由

/ 韩国昌原KC国际诗文学奖评审委员会 406

部分对王家新诗歌的评论摘要 408

**附录一：王家新访谈三篇 429**

回答四十个问题（节选） / 429

回答普美子的二十三个问题 / 451

“当一种伟大的荒凉展现在我们面前”

——诗人王家新访谈 / 吴投文 477

**附录二：王家新著译及文学活动年表（1957—2016） 504**

# 我们这个时代的写作

◎ 非 默

无论眼下的日子如何麻木、沉沦，王家新的诗歌写作已在暗中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极为重要的精神事件。

每当我们理解一个诗人时，总是首先试图理解诗人所处的那个时代；而理解诗人所处的时代，似乎结果往往比理解诗人本身收益更大。这种情形如同写作自身，一个诗人的写作正是从理解他自己的时代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讲，诗人并不真正存在，甚至诗人所写下的作品也不存在（那不过是些分行的文字而已），存在的只是时间，是诗人曾经经历的一切。一个诗人所能够做的，只是在必要的时间用语言将时间——一个个连续的瞬间固定下来，并印在空白页上，然后时间会自己开口说话。不管一个诗人对诗歌怀有多大的抱负，或对这个世界有着什么样的期望，到头来，他所能传达的只能是他自己的那个时代。无论一首诗多么伟大，都是有其范围和界限的，一旦越出了这个范围和界限，诗人的价值和意义便会减弱，甚至消失。从较为深远的背景上来看，这个范围和界限不是地域的，亦不是种族的，而是时间。具体的时间——此时此地的时间，或彼时彼地的时间，是时间将人引入生命，又推向死亡。同

样，对诗也是如此，是时间在做去伪存真的工作，决定最后的存留或是湮灭。正如诗人不能目睹诗歌而为诗歌所目睹一样，面对时间，任何一个诗人也无法进行选择，他只能站在被选择的位置上，时间一旦选择了他，他即成为一个承担者，一个见证者，使他成为他那个时代写作的保证。

我们的诗歌发展，一如我们这个时代，已来到一个紧要的关头，对于中国诗坛，一次认真而彻底的清算迟早是不可避免的。近半个世纪严密的封闭和可怕的匮乏之后，我们在最近的十年里突然一下子有了似乎数以千百计新起的诗人和数十倍、数百倍于诗人的诗作，这些诗作以前所未有的大胆和自由进行着形式和内容上的翻新。我们在有理由相信这一努力拓宽了我们的诗歌视野，加深了我们的诗歌感受的同时，亦使我们的精神遭到了超负荷的消耗和急剧的透支。从诗歌现象本身来看，我们不无自卑和忧虑意识到，这来势汹汹的诗歌大潮，只不过是西方世界近百年的诗歌现实在中国一次集中且焦虑的投影而已。其中很少我们自己的创造。我们那些最好的诗人过早地将严肃的写作送进了语言的实验室，这使他们诗人的身份在某种程度上也有所改变，无论诗人或诗，玄学和神秘的意味是愈来愈浓了。这种情状，一直延续至今。我们当然不反对诗歌“实验”，但什么对于这个时代才是重要的？必要的？这一点，我们不能不发问，任何一个严肃的诗人对这一点都必须有所自觉和领悟。我们为他人的伟大和纯粹所晕眩，竟不顾自己的生存现状和实际存在，亦无视自己的时代，虚构着种种令人怀疑的自由和光明，我们一边在忍饥挨饿，一边在涂抹着画布上的面包。如果仅仅是在一个平庸的年代，尚使这一批评（或自责）

显得并无多大实效。而时至今日，当一个非凡的世纪已经走到了它的末尾，而我们又被迫重返历史，之后，还能保持平静和冷漠，或者，依然无力进入严肃的写作，依然无力使我们的笔触抵达事物的本质，那就近乎卑鄙了。海德格尔说：“我从我的‘我在’去工作。存在就靠这个实际而怒吼。”我们呢？我们在膜拜了海德格尔之后，却使存在更加沉默。如果这些指摘不幸背离了诗歌的精神，那我们宁可没有诗歌。道理很简单，在人类的生活中，仅仅少了一种修辞，算不上是什么大的损失。遗憾的是，几千年来古老的智慧并没有使我们可悲的语境有任何实际改变。面对这种现实，如果我们不能具备一种更为坚决、彻底的语言立场，如果我们不能使另一种语言带有水和火的痕迹，那我们怎么能够谈得上严肃的写作，怎么谈得上对生存和死亡的承担？一个诗人的职责只有在保持了诗歌道义的前提下，才有可能维护他使用的语言。从实质上说，这种道义就是诗歌最为重要的品格——真诚，而真诚永远是语言的贞操。正是语言导致了现存的一切，海德格尔认为语言是一种“天命”，这一天命洞穿了无数世代，将无力承担者一一击倒。这也就是时间往往缄口不语，长久沉默的原因。我们不能脱离时间来谈论诗歌，正如我们不能离开具体的生存谈论人的命运一样。这样做的危险是容易失去价值的尺度，从而导致历史的虚无，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会造成抽象和隔膜。还有一个十分明显的原因，就是一首诗永远是具体的，这种具体体现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语言和不同的时代上。伟大的诗人不管从哪个角度看，总是首先忠实于他自己的存在和他那个时代的精神的。尤其是在当今时代的重压下从事真诚的写作，还有一种更为积极、更为高尚的目标，它的

意义不仅是在感受自由,它更是自由本身。

对于北岛之后的中国诗歌,我很早便有一种不合潮流的见解,我以为,中国诗歌的挫折与冒进,在于北岛所开辟出来的道路过早地被后起的诗人切断了,而这条道路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理应得到延伸和拓宽,事物的表象轻易地蒙骗了那些阅历尚浅而又急于成名的年轻诗人,他们太为“不朽”操心了,他们讨厌公众事件,很少考虑自身之外的责任和需要,并渴望由此写出能够垂之久远的诗歌。结果,使匠心充满了富于取巧的意味。以历史的眼光来看,这也许是一种必然。真可谓是“物是人非”。在一切趋向物化的今天,谁肯承担孤独深入人类的命运,谁肯面对生存的压迫、死亡的逼视坐下来写作?谁肯站在时代的证人席上承受诘问的苦刑?在这里,时间显示了它足够的耐心。对我们而言,结束这种不幸,直到王家新经由一次彻底的蜕变,重新在隐蔽中出现。波兰诗人米沃什有这样一句话来谈论他自己:“如果不是我,会有另外一个人来到这里,试图理解他的时代。”在我看来,这句话对王家新也同样适用——王家新已经来到了这里,虽然他是刚刚到达。

出于某种个人的理由,这篇文章没有具体评论王家新的诗作,而只是较为深入地指涉了他写作的依据和背景。我想,这比具体地进行一些文本阅读更能使我们认识他写作的性质以及他对中国诗歌的重要意义。王家新的诗歌就摆在这里(我指的是他这两年的作品),不需要任何阐释和分析,这些诗写得清晰、准确,主题的表达既不迂回,又非旁敲侧击,而是像刺入黑暗的刀子一样直截了当。就其最功利的目的而言,这种写作不仅仅是一种抵制和反抗,亦不仅仅是在这个年代试图重新找回人性的高贵与尊

严——这仅仅是王家新现实的一个“支点”。这些为数不多的杰作，有着更为深刻和理性的悲剧蕴涵：其巨大的现实感在迫使我们从内心转向外部世界的同时，亦使我们不得不经由外部世界重返内心，再次经历我们的灵魂在奔向未来的途中曾经经历并可能经历的一切爱与恨。

(载《今天》1992年第1期)

# 王家新论

◎ 程光炜

王家新是相对于一个时代的诗人。抑或可以说，时代这面暗中荒诞的镜子，也在造就着它的称职的作者？我们不妨回忆一下诗人的旅程：从湖北西北角的丹江口市到该省文化中心武汉，再从这个国家的中心北京到英国和比利时（1978—1993），王家新完成了他求学、恋爱和确立信仰三部曲式的人生形式。然而，王家新的心理发展却是逆向性的。二十一岁以前，丹江口疏于机巧而偏于古朴执著的淳朴民风，对他心灵气质的深深揳入，大概非任何因素所能比附。倘若说，人的性格气质构成了他行为的准则及动机，那么王家新命运中一连串的故事，他上述表面上顺理成章、其实暗礁迭现的人生旅程，也就早早潜在现实的逻辑之中了。

但难就难在对诗人自我的把握上。它既是理智的认知，又是情绪心理的创造；它既顺从外部环境的辗压扭转，又坚守培护着内心世界的质的规定性。我不禁对王家新个人命运和诗歌命运的关系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他真的拥有今天这种境界吗？他是如何到达的？

王家新1978年春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叶圣陶、沈从文、闻一多等一批现代文学大家曾一度云集这里。试想，从这一深厚的文学土壤上起步，难免有想入非非乃至胆大妄为的举措。在当时某个著名油印诗刊的影响下，他和同学创办了一个诗刊，并写下了后来为许多高校传抄一时的《桥》。他曾为结识朦胧诗人顾城激动不已；对他的创作乃至人格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是他这时拜七月派著名老诗人曾卓为师。但他很快转入了符合社会规范的写作，并因风格沉郁厚重的组诗《北京印象》和长诗《“希望”号渐渐靠岸》声名渐起。王家新天生是一个诗人，在他这种年纪，很难不为自己非凡的艺术创造力和第一次“高峰体验”所陶醉。正是这种混杂的激情决定了他初期诗歌的驳乱面貌。

1982年春，王家新被分配回他的家乡丹江口。他本来是可以成为文化古都北京的新居民的，残酷的命运恶意地嘲笑了诗人，使他有点像那个不断将石头推向山顶的西西弗斯，悲剧倒不在于从终点回到起点这个圆圈形式，而在于他必须独自咀嚼切实的感觉。我不清楚诗人在那所乡村师专里是怎样痛苦地挨过诸多黯淡的日子的。但我敏感到了他诗风由外向内的变化。这是否证实了一个基本的艺术原理？任何时代里的优秀作家都是被逼出来的，如果内心深处没有升腾起无法遏止的个人感受，没有末路英雄般的绝望激情，恐怕谁都不会走上那艺术创造的艰难道路。1985年问世的组诗《中国画》，无疑是抹去了青春铅华的朴素之作。

不是隐士，不是神  
你浑然坐忘于山林之间  
如一突出的石头

——《山水人物》

他此时的心态，未免有点未老先衰的苍凉。人生战场上的失意，被转化为“将一切看淡”的超然，就一定是诗应该趋向的境界？王家新当时未必意识到这一层，但不可否认，诗人的创作心态与早期相比，已然变得沉重和宁静起来。要紧的不是道教老庄“超然物外”的态度触发了诗人的写作灵感，而在于他内心开始产生了审省自己的某种要求：“是谁从雪地上寥寥走过？/遂惊醒/灵魂又返回自身……”（《雪意》）“你画出了山，画出了云/但这空白处/你迟迟不愿下笔”。命运教会了王家新严肃，将他重新还原到“丹江口”古朴执著的传统文化氛围中。

回到《中国画》，我发现，当青春期的潮汐及其牢骚退去之后，在他诗歌中“突出”出来的，不仅仅是“石头”，还有“雪”和“灵魂”。问题不是这几个意象硬朗的词，而是它们出现的意义。这正像当时朦胧诗人们开始从“枪口”“坟墓”悄悄向“半坡”“敦煌”等词汇转移一样，外在激烈的革命性叛逆并不能解决灵魂的问题。它不失时机地对诗人们提出更为内在的要求。我当然不满足于在一个相对固定明朗的文学背景上谈论王家新，而意在证明，他创作上非同寻常的转向，并不纯粹属于个人行为。

王家新是一个生命力和抗争意志同样强盛的人。命运将他强行摁在那个僻远的乡村师专。对于作家来说，表达的过程也就是自我

发现的过程。他越是陷入这种屈辱的痛苦，反而越有可能深切地表达自己。出于生存的考虑，呐喊方式在这里显然是不行的，它只能通过象征、隐喻乃至曲笔将其发散给读者。《中国画》以退为进的象征性写法符合其艺术要求。在这时，王家新找到了突出创作困境的方向。幸运的是，恰在这时，由于两位老诗人的鼎力相助，诗人也突破了他的“乡村环境”，进了北京的《诗刊》编辑部。同时，王家新结束了他早期的写作。

## 二

1985年的北京，是王家新闯过命运的激流险滩后一片壮阔宁谧的江面。但1985年的诗坛并非世外桃源。北京的朦胧诗群自江河、杨炼分裂出所谓“文化诗”后，已呈衰退之象；而南方诸多地下诗人，这时正酝酿着向北京现代诗的正统地位发起挑战。王家新在骨子里是演正剧的角色。北方儒家深挚执著的文化人格，较之楚文化的绚丽浪漫，更能深刻地左右他的思想行为。顺便说一下，他假如稍许有一点楚人的乖巧，是不会有关于那一次命运重重的磕绊的。文化选择决定着人生选择也包括艺术范式选择，每个人常常是“不由自主”地实现着某种命定的角色。在社会风尚多变的思潮中，你也许会有短暂的偏离或转向，但一旦在摇晃中站住脚跟，便会回到原来的位置上。我将其看作诗人人格的“底色”。正是出于此，王家新在纷乱不定的诗坛格局中坚决维护那份已内化为他人格行为的传统遗产。“文化诗”和“文化寻根小说”后来被认为是由作家们读书的成果。王家新也沾染了这种京城风气，好在

王家新不避讳这一点：“禅的秘密是以瞬间形式体现永恒，诗的‘秘密’也往往如此”。“像中国画中的那些山水人物，不是凌驾于万物之上，而是在万物存在的空间里浑然‘坐忘’成一块石头”。为增强这一说法的逻辑力量，他将帕斯和勃莱也一起拉了进来。是勃莱《冬天的诗》，抑或是博尔赫斯《另一只老虎》中关于某一动物突出醒目的意象，启发他写下了《蝎子》？至今无据可证，但乃读诗所得，又完全可信。

翻遍满山的石头  
 不见一只蝎子：这是小时候  
 哪一年、哪一天的事？  
 如今我回到这座山上  
 早年的松树已经粗大，就在  
 岩石裂缝和红褐色中  
 一只蝎子翘起尾巴  
 向我走来

与蝎子对视  
 顷刻间我成为它足下的石沙

——《蝎子》

对语言的操作较前有惊人的进步，但它又与我们每个人的真实存在无关。

再往深处探究，我发现它其实与王家新当时个人命运感的“变